

評「中國之命運」

陳世遠

目次

評「中國之命運」

陳伯達

誰革命？革誰的命？

范文瀾

「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

艾思奇

駁蔣介石的文化觀

齊燕銘

評「中國之命運」

陳伯達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擔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奇怪：蔣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爲什麼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奸群、索日鼓吹法西斯主義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衛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遠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難道國民黨中真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爲什麼中央周刊這樣尊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蔣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佈不成？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中國之命運」既是以蔣介石先生的名義出版的，就因蔣先生的關係，引起了人們

的注意。當此抗戰處在重要關頭的時候，大家想蔣先生在這個時候出版這本東西，應該是對於如何準備對敵反攻、配合盟國作戰、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重大問題，有所指陳，因為盡人皆知：今日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是抗戰，而不是其他。但大家讀到「中國之命運」後却未免大失所望，原因是那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和人們所期望的都相反，而且關於抗戰問題，在全書二二三頁當中，只佔了十二頁半。全書的中心是談內政問題。一言蔽之，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實際上主張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或新專制主義（雖然形式上仍戴着「三民主義」的帽子）。因此使人們大失所望。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素來鄙薄那種掩蓋自己政見的人，蔣先生並不掩蓋自己的政見，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共產黨人對於蔣介石先生此書是不同意的，我們既有不見意見，我們就有責任把自己的意見公開出來，以求國人之審察。蔣先生也說過：如有人對國民黨的「行動或態度有什麼錯誤，那你就應該來糾正他，來補救他」，那末，好吧，我們就提出意見來和作者及讀者商討，這應該是完全必要的事。因為蔣先生此書所討論的，是關係於中國之命運，關係於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故不但每個共產黨員應該十分注意，絕對不能忽視，而且是每個中國愛國人民都應十分注意，絕

對不能忽視的。近日國民黨方面竟在圖謀「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中國國民黨指導的中央通訊社業已公開發布了這個消息，可謂到了怪論百出的時期，我們共產黨人自然不能默爾而息。但這種怪論是有根據的，只要一讀「中國之命運」就可找到這種根據，因此使我們更加不能默爾而息。本文所批評的，限於書中的幾個根本觀點。至於書中的其他觀點以及對於許多觀點的詳盡批判，只好俟諸另文及別同志的著作。作者及讀者乃至任何愛國人民如果對本文有不同意見，我們希望提出辯論。真理是不怕辯論的，怕辯論的就不是真理。無數的國民黨刊物對於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批評得一塌糊塗，我們至今還沒有回答，現在就以蔣先生此書為契機，發表我們共產黨人的意見吧。

(一) 關於中華民族

蔣先生此書對於中華民族的了解，和本來的歷史真實情況完全不相符合。此書說：

「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民族血統論。本來是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這類怪論去作爲進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蔣先生也以血統立論，實屬怪事。這類怪論，決不能解釋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平日我們習用的所謂「中華民族」，事實上是指中華諸民族（或各民族）。我們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這本來是不用多辯的。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革命黨人的反滿運動，就是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舉行的。而且孫中山先生手訂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就明明白白寫過：「中國境內各民族」。否認這種見解，等於否認孫中山先生及其主義。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却別開生面，承認中國只有一個民族，這是很可駭怪的意見。按照作者的見解，則孫中山先生稱辛亥革命爲民族革命，這不是無的放矢嗎？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這又不是無的放矢嗎？蔣先生的意見，不明明是和孫先生的意見相違背嗎？

我們請研究一下：漢族和蒙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藏族本來

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西來的回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苗族齊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羅羅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出自何經？據於何典？這是從那裏考証出來的？作者引了詩經「文王孫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難道現在中國諸民族都是文王的孫子嗎？凡此都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常識，並不需要什麼高深學問才能理解的問題，作者違背了這點常識，故弄得毫無是處。在此問題上，作者還提出所謂「婚姻的繫屬」，但是我們也請研究一下：難道漢朝王昭君出塞（不要忘記呀，這段歷史曾經是漢民族統治者向匈奴民族統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劇）就使得匈奴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難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若然，則近代許多中國人（其中包括現在國民黨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華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嗎？

把中國國內各民族做那種解釋，則全部中國歷史都變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塗賬。如果照那種解釋，則漢時代漢民族和匈奴的戰爭，就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或者說是大小姓的衝突吧）。五胡亂華、南北朝那時代漢民族與各民

族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唐時代漢民族和回紇、吐蕃、沙陀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五代時漢民族和契丹的戰爭，宋時代漢民族和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明時代漢民族和蒙古、滿洲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太平天國和同盟會反滿的戰爭，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若然，則岳飛、文天祥、陸秀夫、宋元璋、徐達、袁崇煥、史可法、鄭成功、李定國、洪秀全、李秀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以及孫中山先生……這一切在漢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為漢民族和中國河山生色的歷史人物，不都都成爲一批毫無意義而死去的愚夫愚婦嗎？而石敬瑭、張邦昌、劉豫、秦檜、洪承疇、曾國藩、張勳……這一切萬惡不赦的漢奸，不又大可以「登廟堂之上」，而「受俎豆於千秋」嗎？按照作者關於民族的解釋和歷史的渲染，則全部中國歷史，必須完全推翻，而我們民族也寄托於烏有。

蔣先生說：「至於各宗族歷史上共同的命運之造成，則由於我們固有的德性，足以維繫各宗族內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德性。」我們也請研究一下：根據前面

所列舉的史實，我們歷史上的民族鬥爭，曾經那麼殘酷，那麼無情，如果現在按照作者所說，那反將作何解呢？是的，歷史上漢民族在反對異民族侵入的時候，是有兩種人的根本分別的，一種人是廣大民衆，他們流血犧牲，抗拒外患，是保衛祖國與光復舊物的基本動力；另一種人則是一些腐敗的統治者，他們在異民族侵入面前，時常採取「寧贈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甚至以「天子之尊」向異民族的侵略者稱臣、稱子、稱姪、稱孫，而每年貢納很多銀帛、綵緞抗戰的大將，以求取得其寵幸（最好請看五代和宋朝的歷史吧）。這些皇帝和臣宰們時常拿出什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這些法寶來駕馭人民，大概他們對於異族侵略者的這種行徑，也就是實行了他們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德性吧。但是，這些行徑，對於我們民族，又有什麼值得誇耀呢？

照科學的了解，民族的特徵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經濟的聯系性）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結構。民族的鬥爭是社會分化為階級後的歷史結果，民族的鬥爭不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也不會永遠要存在。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戰爭，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是「爲人類的永久和平而戰」。不僅如此，在人類大

國還沒有實現以前，某些本來曾經是互相鬥爭的民族，但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也竟可能同化起來，變成一個民族，比如：中國以前入居中原的許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漢民族同化了。今天，滿民族在事實上也已同化於漢民族了。但這決不是由於什麼漢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於他們在內地和漢民族混居，漢民族在經濟上、在文化上、後來並且在政治上，都比較他們先進，比較他們佔優勢，而在人口數量上也較優越，這樣就在長期的殘酷鬥爭中逐漸地同化起來了。

現在是科學昌明的世界，民族歷史必須按照科學去解釋。法西斯主義曲解民族歷史、削改民族歷史、捏造民族歷史的伎倆，決不足為訓，如果拿這種東西作為國民的教本，就會愚弄國民。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所以要捏造這種單一民族論，其目的就在於提倡大漢族主義，欺壓國內弱小民族。我們漢民族本來也是一個很弱的民族，正應和國內一切弱小民族進行平等的民主的聯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我們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一方面又要拿大漢族主義去欺壓國內其他弱小民族，那就會給敵人利用的空隙，而不利於我們民族解放的事業。這是每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所應該注意的。

中國和外國的一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總是盜竊「民族」為私有，好像民族即除，脫

即民族。請研究一下：民族是由什麼人組成的呢？我們這民族的絕對大多數不是工農群眾嗎？如果沒有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動民衆，我們民族從何處得到衣食住，從何處組成抗戰的軍隊，又從何處有文化？工人農民不正是民族的主體嗎？不正是他們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嗎？不正是他們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名義嗎？而其他的人，反對工農大眾的人，却自稱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種篡竊嗎？既然勞苦大眾是民族的主體，那末，只有勞動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不是很明顯的道理嗎？把勞動人民看成至下，這不就是把民族看成至下，把國家看成至下嗎？

誰是民族的主體？答覆這個問題，才解釋得了民族這個問題，才解釋得了民族的力量的問題，才解釋得了我們民族的組成以及過去所以衰而復興、亡而復存的問題，才解釋得了如何準備反攻、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問題（即要不要動員民衆、實行民主的問題），才解釋得了抗戰後中國誰才應當爲主人翁的問題。在幾年前，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共中央許多文獻，曾給我們答覆了這個問題。但是「中國之命運」的作者却把「少數人士」和「德性」當成民族的決定者。這就是我們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關於中國之命運問題上的根本分歧點。

(二) 關於中國歷史

我們繼續說中國歷史，特別說一說近代中國的歷史吧。中國歷史應該是民衆的歷史，因為沒有中國民衆，就沒有中華民族。中國歷來和自然界戰鬥，和黑暗制度戰鬥，和侵略者戰鬥的主要力量，是中國勞苦民衆。民衆是中國歷史的主要動力。中國民衆歷來創造一切幸福，但是他們自己却沒有了一切幸福。中國動人民和民族的苦難戰鬥，但是在過去，一切果實却被少數統治者竊取而去，而自己則仍落到最受苦難的結果。每當中國民衆被統治者剝削壓迫得最痛苦、最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外患也就隨之而來，但民衆又成爲「我必復之」的力量。蔣先生說：「自滿族入關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漸漸消滅了。」這話是完全不對的。事實上，滿族入關以後，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那些統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廣大人民群衆，仍然是最富於民族思想的，並且不斷地進行了民族的鬥爭。歷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轉移，則民衆的自覺力量也越大。在滿

清入關以後，中國人民的民族思想，遠比過去任何異族統治中原時代要廣大、要深入、要長遠。三合會組織的蔓延及其長期不被消滅，就是最好的說明。孫中山先生也說：「……士大夫醉心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這是公道話。民衆的民族思想的發展，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和此相伴隨的，就是腐敗人們奴才思想的發展，而其登峰造極的代表人，就是作者書中所不斷稱讚的「曾滌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記呀，這是滿清朝廷因爲他剿漢有功而給他死後的諡號）。至於作者關於滿清的歷史，如此寫着：「有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精密，猶能紹漢唐的餘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爲元代所不及……假使滿清對國內漢滿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視同仁，認識我五族在實質上本是整個的一體……但這是時代與思想的關係，我們非所望於當時的滿清能施行這樣政策，固不可求備太苛……」這些話裏一點民族思想也沒有，則是千真萬確的。

清代中葉，中國民族遇到了一種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這種新的民族侵略者挾持其資本主義的優越經濟力量，打開了中國的長城。但中國人民並不是不能抵抗這種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國抵抗力的軟弱，是由於滿

滿朝廷一方面在國內各民族之間所造成的民族牢獄，另一方面在人民之間所造成的專制主義牢獄。作者說：「我們百年來國勢的陵夷，民氣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條約爲原因」。這是倒果爲因的說法。中華民族爲什麼會被釘上不平等條約的枷鎖？這難道不是因爲萬惡的滿清黑專制政治，使得民氣不得發揮，人民不得奮發起來抵抗侵略者才產生出來的一種結果嗎？如果按照作者的說法，則在訂立不平等條約之前，應該是國勢鼎盛，民氣興旺的時候了。但是，既然國勢鼎盛，民氣興旺，爲什麼又會有不平等條約呢？

但作者又說：「國恥之所由招致，又必須追溯於滿清一代政治的敗壞，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這不就是「原因」了嗎？如果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說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如此邏輯，豈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這裏說的是「政治的敗壞」（帶一筆：作者不願意說是專制政治，此點我們後面還要說及），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感嘆滿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精密」嗎？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說，「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所以有了國恥，可是，作者不是說過嗎：「滿清道咸年間，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之流，亦以

轉移風氣爲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剛，而用人則重血性，尙器識。其於學術思想，則兼取宋學與漢學而歸本於至誠，其立身行事，則本於「慎獨、主敬、求仁、習勞」的精神，故湘軍雋勇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樣，宜若國恥可以由此減少了，爲什麼又弄得國恥如麻呢？歷史的教訓顯然是和作者所說的相反；原來中國之弄的國恥如麻，恰恰是因爲曾國藩李鴻章輩的「湘軍雋勇的成功」。不是嗎？請研究一下：太平天國會統治了許多省份，時間十餘年，和外國人也有來往，但是，太平天國畢竟沒有和什麼外國訂過不平等條約，不就是因此惹起洋大人生氣，組織了「戈登常勝軍」，使太平天國內外受敵，而陷於失敗嗎？如果太平天國獲得勝利，把「曾胡左李之流」打得落花流水，打倒了清朝，建立新國，發揚了民氣，創立了國防，則外國侵略者就不可能送我們這樣多的國恥。所以我們說，湘軍雋勇的成功，就是民衆的失敗，也就是洋大人的成功。民衆失敗，洋大人成功，國恥自然就多起來了。

應該介紹孫中山先生的兩段話：

其一：「從前衰弱，實因壓抑於專制淫威所致。」

其二：「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便非

「提倡民權不可。」

孫中山先生的話，是扼要而中肯的。中山遺訓在其信徒中的被遺棄，不是很可悲的嗎？

要救中國，必須發揮民權，必須把舊中國重新改造，這不是天經地義嗎？其所以要
把舊中國重新改造，不就是因為舊中國的統治太黑暗、太殘酷、太落後、太虛偽嗎？不
就是因為舊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無孔不入地剝奪廣大人民——首先是農民——的血汗，使
得廣大人民飢寒交迫，因而使得國民經濟不得發展起來嗎？不就是因為舊中國的統治方
法從保甲制度到中央政權，都是窒息人民的生機及其政治活動嗎？不就是因為舊中國的
思想教育制度及其政策是愚民制度和愚民政策嗎？不加改造的舊中國，如何站得起來？
如何能够抵抗得外患？在今天抗日戰爭中不求進步，一味倒退，又如何能够最後戰勝敵
人？然而不幸，「中國之命運」的作者竟把這樣的舊中國寫成「黃金世界」；海禁開放
前舊中國的經濟是發展得那麼好，政治是那麼好，風氣倫理是那麼好，一切都幾乎是全
世界第一。可怪的，既然一切都那麼好，為什麼打不過外國侵略者，而且要時常與當
時的敵人作城下之盟，訂立那麼多的不平等條約呢？本書的自相矛盾，這又是一件。

爲使讀者明瞭起見，把作者所描寫的中國古代「黃金世界」抄列於下，讀者一見，就知全是妙文：

關於經濟：「我們立國的基礎，本是農業。全國的農業，除邊疆省區外，分佈既不失均衡，故全國的人口，疎密亦相差不遠。政府對全國交通的計劃，平均周遍，世代相承。經濟的趨勢，雖起自河流而傾向海岸，然而建國的成規，並不見有什麼偏枯的現象」——（五九頁）

關於「社會組織」：「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在血統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鄉社。兩方面的系統都很分明，兩方面的訓練和教育，亦最爲古來的賢哲所致力。由個人日常生活的箴規，推而至於家，則有家禮，有家訓；推而至於族，則有族譜，有族規。在保甲則有保約，在鄉社則有鄉約和社規。其自治的精神，可以舉修齊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眾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則有鄉校和社學。言賑濟則有義田和義莊。言積穀備荒則有社倉的儲蓄。言防盜緝姦則有保甲的連坐。乃至堤防溝洫，道路河川，無不由鄉社的羣力，以從事於修築和疎濬。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